

古今圖書集成... 工業附編... 八十餘種，三十餘萬言，糊圖四百餘... 其一，印刷術試中國式寶貝相照

古今印刷史觀的來龍去脈

李興才 (彩色圖照刊第三頁)

第一本誌七十九卷第一期(總四六七期)，刊出曾習賢教授以「古今中外第一部《中華印刷通史》李興才教授的名山事業」為題的宏文，除簡介印刷及我出版的印刷通史之外，副標題和對本人過譽之處，愧不敢當。曾文中提到：編者出版《中華印刷通史》，是受我倡論「大印刷史觀」的影響，獲得兩岸許多專家學者的認同與支持，乃提出計畫，邀約十餘位志同道合的書史學者和印刷專家，共同合著這部史書。其中「印書史觀」和「大印刷史觀」，都是我在十三年以前提出的新名詞，讀者諸君，或不明究理，爰為註釋，說明其來龍去脈；因為印刷術為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貢獻的四大發明之一，國人有知的權利。我於一九四二年考入中央測量學校受印刷專業教育，校長蔣中正、教育長曹謨、教育處長夏堅白。一九四四年畢業後，到印刷廠工作四年，再考入大學部深造印刷四年，重回印刷廠工作。一九五五年起，轉任教職，先後在測校大學部、中正理工學院、文化大學教授印刷相關課程，直到一

印刷生涯逾甲子

任副教授兼印刷研究中心執行秘書，經手改組印研中心為印刷工業研究所，後任副所長、所長。成立印刷工業專修科，兩年後改制為印刷學系，是為當時全國唯一的印刷學系。成立華岡印刷廠、增設推廣教育中心印刷研究班、增設造紙印刷研究所碩士班，內分造紙及印刷兩組。先後擔任系主任、組主任、班主任、研究所長二十三年。又陸續兼任台灣藝專、復興

工專、世界新專、台灣師大等校教授，合計受教畢業的印刷學士三千三百餘人，印刷碩士一百五十餘人。曾出版著作二十餘種，如《印刷工業概論》、《印刷短論集》、《印刷技術手冊》一套二十七冊、《印刷工業叢說》、《印刷論文集》一至五集等。連續在文化大學任教三十四年，曾獲創辦人及董事長贈感謝狀、教育部於一九九二年頒特殊優良教師獎及服務獎章。山專業一感恩函文，刻錄如下：

「在樂育英才之餘，先後創設「中華印刷科技學會」任創會理事長、創設「財團法人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」，任董事長四任迄今，樂此不疲，濫竽印刷行業六十三年，無怨無悔。如果讓我再年輕一次，仍將繼續印刷生涯。」

以大印刷為內容的《印刷

工業概論》

在我編著出版和主持出版的印刷

專書當中，以《印刷工業概論》、《印刷技術手冊》、《中華印刷科技年報》、《中華印刷通史》的工程較大，影響也較為深遠。而《印刷工業概論》則是印刷新鮮人入門的基礎必讀之書。茲，將書中重要內容，分述如下：一九七〇年，我受聘為文化學院印刷學系教授兼系主任，主講課程中有一「印刷概論」，因無適當教材，乃自編講義試用，經過反覆修改，於一九七三年成書出版，在文大出版部的發行簡介中指出：「本書內容廣博、取材嚴謹、行文簡約、附圖詳實。自印刷之定義、功用、科學、技術、藝術、史略、要素、分類、教育起，至印刷原稿、照相分色、拼版打樣、製版印刷、裝訂加工、特殊印刷、印刷經營止，兼及紙張、油墨、設廠、業務、管理、品質、成本、安全等，皆用提綱挈領方法，作深入淺出之論述；計凡十三章八十七節，三十餘萬言，附圖四百餘

幅，彩印精裝。此書在手，不僅可得研究印刷工業之萬能鑰，亦為展示我國印刷工業之里程碑。」
 文化學院創辦人張曉峰在該書序文中指出：「本書為作者多年專精研究之結晶，撰為是編，公之於世。其對於印刷工業，可謂面面都到，鉅細靡遺，以清楚之條理，明快之文筆，豐富之插圖、精美之彩畫，勝義絡繹，融於一爐，為大學印刷學系引導入門之基本要籍……」
 該書出版之後，曾獲科學類優良圖書獎，各級學校印刷科系多採用為教材，國家各種印刷考試亦列入命題參考書籍，其後每隔三至四年即修訂再版一次，至一九八九年，曾六次修訂、七次印刷，行銷近三十年，如今已功成身退。本書是以「大印刷」為內容，要點有六：

其一，印刷術為中國先賢長時期綜合演進的集體創作，並非某人於某

時所發明。其
其二，依印刷品之性質，分為文化印刷、商業印刷、工業印刷、美術印刷四大類。書、報、刊物等讀物的印刷，僅屬文化印刷中的一部分。

其三，印刷載體的被印材料，不限於紙張。紙張印刷屬普通印刷，紙張以外的任何材料均可印刷，稱特殊印刷。

其四，印版不限於雕刻凸版、活字版、照相凸版、凹版、平版、孔版、無版亦能印刷。
其五，印刷不限於用「刷」而後得「印」，用刮、壓、拍、打、噴、甚至無壓，均可複製圖文。
其六，印刷為綜合性的應用科學，與當代的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均息息相關，印刷乃民生工業之一。

梁啟超和凌純聲的啟迪

讀一九五六年七月由台北中華書局出版的梁啟超所著《中國歷史研究

法》一書，其中在「史之改造」一章中有言：「治專門史者，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，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……做文物專史，一須專門，二不可貪多，若能以終身之力量，做出一種文物專史來，於史學界便有不朽的價值。」印刷史，應屬文物專史之一種，我身為一名老印刷人，對印刷史感到應該肩負一部分的責任。

又讀故中央研究院院士凌純聲於一九六三年在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專刊》之三發表之《樹皮布印花與印刷術之發明》一文中說：「印刷的技術，在新石器時代與印紋陶器同時的印刷樹皮布花紋，早已存在了。近世學者所討論的印刷發明，是雕版印書始於何時的問題而已。古代印璽用於印布、印帛、印泥、印木、印陶，皆印刷術之先河，蓋璽之鈐拓，與雕版印刷，在技術上不過一間之差耳。至於模印瓦當甃磚的花紋文字，為雕版印泥，在技術上完全同於雕版印刷

，其不同者，為所印之物一印泥一印紙而已。」凌純聲在同一專刊的另篇論文《印文陶的花紋及文字與印刷術發明》中說：「新石器時代的印文陶祇印花紋，至戰國才有陶印文字，秦漢時模印磚瓦文字盛行。故研究中國印刷術發明的時期問題，在廣義方面，應溯源至新石器時代的樹皮布印花和印文陶印紋；至於狹義的印文字，則先秦時璽印陶文和磚瓦模印文字早已開其端。今之史學家謂中國印刷的發明，應在八世紀上半期。這祇能說是印書於真紙的開始，不是印刷術發明的正確時期。」凌文和我的《印刷工業概論》一書，係同時出版，理念和觀點不謀而合，使我對印刷史的研究，信心大為增加，意志益為堅定。

印書史不算印刷史

一九九〇年初，我率領台灣「印刷科技探親訪問團」一行二十四人訪問中國大陸，在北京蒙中國印協惠贈

「一冊新出版的張秀民鉅著《中國印刷史》，返台後即細心研讀。作者花費四、五十年心血，鑽研中國印刷史的精神和所獲致的成就，由衷敬佩。洋洋六十四萬言的《中國印刷史》，於一九八九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，就先後獲得國家級的「畢昇獎」、日本「森澤信夫獎」、「華東優秀讀物一等獎」，由中國人寫中國印刷史，是一部空前的著作。在分量上也

超過美國人卡特所著《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》一書，足以為中國人揚眉吐氣。印刷史學權威，為英國李約瑟寫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一書《紙和印刷》分冊的美籍華人錢存訓，在序文中說：「本書內容廣泛，體大思精，包羅了自從印刷術發明以來一千多年間全部刻書和印書的歷史，……這是迄今所見到的一部最完備而有系統的綜合之作。」
我在同年八月，撰了一篇短文《印書史非印刷史——讀中國印刷史有感》，發表於香港《印藝學會月刊》第八十期，北京《中國印刷》隨後轉載，我除了表示對張著的敬佩之外，也提出我對該書的看法：

其一，張著在凡例中就率先表明是「以朝代為次，論述自唐初貞觀至清末宣統一千三百餘年間的印刷發展史略。敘述雕版印刷的起源及各朝刻書概況。」在附錄「中國印刷史大事年表」第一則就說「約六三六，貞觀十年，唐太宗梓行《女則》（世界雕版印刷之始）」。張秀民肯定中國的雕版印刷術發明於唐初貞觀十年，是將雕版印刷和雕版印書混為一談，誤認印書史為印刷史。這部書應該稱為《中國印書史》，因為《女則》有十篇，裝訂成冊，便是書。但人類文化

乃先有圖書，後有文字，印刷術也是先印圖書，後印文字，圖畫的印刷，內容由簡而繁；文字的印刷，字數由少而多，後來方有圖文混合的書籍印刷。雕版印刷術，絕不可能在發明之初就用來印書。古代印斑文布、印符咒、印佛像、印紙牌、印交子（鈔券），都不是書，但確是印刷品，印刷可以涵蓋印書，印書則不能代表所有的印刷。

其二，張秀民說：「把文字或圖畫印刷在紙上，能起著保存及流通作用的，才算是真正的印刷術。」這完全是站在圖書版本學立場談印書史的說法，如果是談印刷史，絕不應該局限於印紙，也不應該局限於印書。如果印在紙上成為讀物的才算是印刷品，被歐洲人尊為合金活字版印刷術始祖的顧登堡（Johannes Gutenberg，一三九九—一四六八），於一四四五年印刷的名作《四十二行聖經》，是印在三百隻羊的羊皮上，並不是印在紙上，如果不算是印刷品，會不會被世人恥笑？書史學家看到的只是書，印刷人看到的是印刷品，書是印刷品，但印刷品不限於是書，印刷可以涵蓋印書，印刷更不限於印紙。印書史屬

印書史非印刷史——讀中國印刷史有感

文化史，印刷史屬科技工藝史，印刷史也早於印書史，不宜混為一談。

「大印刷史觀」的孕育

與實踐

印刷是綜合性的應用學術，現在是學術整合的時代，學術與學術之間，彼此重疊的範圍愈來愈大，相互影響的部分愈來愈多，凡事應從整體來看，自全局著想，把握大方向、大原則、開創大格局，方能解決問題。雖然自宋代以來，已有印刷史家著作的專書約六十種，論文集約二十種，書影圖錄約十五種，論文約六百篇，但十之九九出自圖書版本學家及目錄學家之手，以書為中心，即使是論印刷史，亦是以印書史為主軸，是傳統的「印書史觀」，將印刷的功能壓縮得太小，將印刷的歷史壓縮得太短，在世界印刷歷史上，等於自我矮化、自廢武功、自暴其短，引生外國人來爭奪中國印刷術的發明權地位。

一九九一至九二年間，北京積極籌設「中國印刷博物館」，每承主持人下問佈展意見，我曾相當堅持：不能將「印刷博物館」搞成「印書博物館」！據理力爭，總算賢明的前輩專家採及芻蕘，將印博館預定設立的「史前館」，照我的建議改為「源頭館」，亦即同意將「古代館」以前的數千年印刷術活動的史蹟，納入印刷史的範疇，不再認為是與印刷術無關的「史前史」，讓差點搞成的「印書博物館」終於回頭轉向「印刷博物館」進行佈展。

中國出現最早的紙張和雕版印刷品時，外國還未曾有，外國人還未曾知，當然不能否認造紙和印刷術是中國人的發明。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，我應邀出席「中國印刷博物館」的奠基典禮及印博館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，次日又出席「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」，我發表〈應從大印刷史觀研究中國印刷史〉的論文。大意是說：將印刷的承印材料限定是紙，將印刷的功能限定是印讀物（書），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印刷史，是傳統的「印書史觀」，範圍比較窄，歷史比較短，格局比較小。若按前述《印刷工業概論》一書所論述內容的觀點來看印刷史，則視野放大，心胸開闊，從整體的、全面的、全方位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印刷史，不是僅談印書史而不談其他印刷品的印刷史，不是僅談印在紙上的印刷史而不談印在其他材料上的印刷史，不是僅談雕刻凸版印刷史而

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，是長時期逐漸綜合演進而成的集體創作，沒有確切的發明人和發明的時間地點。但並無損於中國發明印刷術的歷史地位，正如現在已經確知蔡倫只是改良造紙技術的人，並不是造紙的發明人，也無法確定在蔡倫以前，第一位發明造紙的人是誰？但並不會影響中國人發明造紙的歷史地位一樣。因為當

不談活字版、孔版、平版、凹版印刷史，不是僅談有了印刷品後的印刷史，而不談印刷品出現以前的源流和歷程，不是僅談印刷技術而不談影響印刷術發展的社會、經濟、文化概況。總之，要打破將印書史誤為印刷史的框架，還原印刷史屬科技工藝史的本來面目。如此，則格局自然大，視野自然廣，心胸自然寬、歷史自然長、範圍涵蓋自然周延，符合印刷是綜合性應用科學的特質，不再強用印書史越俎代庖印刷史，也符合文物專史的原則。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印刷史，便稱為「大印刷史觀」。

一九九五至九六年間，我與印刷史學家張樹棟共同策畫，在印刷傳播與才文教基金會全體董事支持之下，邀約十餘位對「大印刷史觀」有共識的專家學者，完全按照「大印刷史觀」來撰寫中華民族從古至今印刷科技發展的歷史。到一九九八年，完成一部圖文一百三十萬言的《中華印刷通

史》鉅著，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了正、簡體字版、簡體字壓縮版、光碟及上網傳播。並自二〇〇三年起重新修訂，增補史料，改正缺失，全書增至一百五十餘萬言，於二〇〇五年在台北出版正體字修訂版，同時拷製光碟傳播。咸認為宏揚中華文化，促進兩岸和平雙贏的一大貢獻。是為古今中外第一部按照「大印刷史觀」撰寫的印刷科技通史，乃「大印刷史觀」得到具體實踐的印刷通史初創之作。

一位發言人的自述

郭雍著 · 定價新台幣三百元正

獨家揭露中油數十年來的故事，
以發言人的角度，
剖析波灣戰爭的石油危機，
更是深入探討石油工業，
不可或缺的**第一手報導**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